

郑鹤声自述暨郑家兄弟的一中缘

我在幼年天天去牧牛、放水,踟躕于垄亩之间。我家位于凤山之阳,从小登高越岭,不以为劳,至今身体健康,犹受其益。大哥鹤春,原名松林,父亲期望甚切,五岁即令入学。我原名松表,又名松彪,以长兄名故,改名鹤声,取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义,故又号鸣皋,以避族伯讳,改名鹤声。

我幼时生过几场病,所以迟至九岁始入私塾。开始由一位叫毛守鹤的先生教读上海彪蒙书室出版的小学国文教科书。那是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的事。因为上学以前,母亲已教我认识了些字,所以上学后读起书来很便当。毛老师说我很聪明,特别奖励,时常对父亲说起。父亲听了自然喜欢,对我特别看待,每晚要我把书中大意或故事讲给他听,他也讲些历史故事给我听,作为黄昏时节的消遣。这样一来,我对于读书特别感兴趣,视书本如至宝,爱不释手,每天早出晚归,未尝懈怠。

1911年辛亥革命后,私塾改为凤山小学堂,仍以毛老师任教职。那时毛老师住在学堂里,晚上没人做伴,我就要求父亲准许我到学堂住宿。从此我每天在家吃了晚饭后就跑到学堂里,由毛老师教我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一年后毛老师辞职,由余诞敷老师继任。他也很喜欢我,我们继续着住

校为当时省立中学之冠。我班国文教师陈棠、历史教师王梦曾、地理教师钟毓龙皆有实学,有名于当时。我大哥比我大十岁,当我刚上学时,他已经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了。他对兄弟很友爱,对人有股热烈的感情,常指导我研究学问的途径。他是学文史和地理的,最喜欢购置那类的书籍。我在一中上学时,他已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文史地部毕业,便将所有大学文史讲义(约有五十多种)供我学习。这些讲义都是外边买不到的,大大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所以中学时代我的文史成绩在全班是最好的。

我入学的年龄虽说晚了些,但对于读书写作之事,仿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识字时起,几乎总是手不释卷的时候为多。幼时放牛于山林之间,书本就是最好的伴侣,大哥曾打趣地说:“弟弟颇有点王冕牛角挂书之风呢!”我小的时候,读书好像一头小犊,随地吃草,并不选择;又好像小蚕,随口吃桑叶,不论老嫩,其贪欲之大,真是无以复加。对于这点,我父亲很不满意,说我东翻西捡,不能专精,担心我将来会一无所成。然而我幼年比较喜欢常读的,是大哥在武昌买的一部《史记》及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编印的《中国历史全书》一套。《中国历史全书》共十八册,自古迄清,蔚为大观,甚为得力。此外尚有《凤山郑氏家谱》、《诸暨郑氏十二公诗集》各一部。我家后面有一座凤凰山,山涧路旁,古木阴森,风景绝幽,尚有先世所筑凤山草堂遗址。我和大哥时常徘徊其间,讽诵着先辈的诗文,引起追慕的情绪。这也是促使我潜心用功,好学上进的一个动力。

《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郑鹤声

附 郑氏兄弟生平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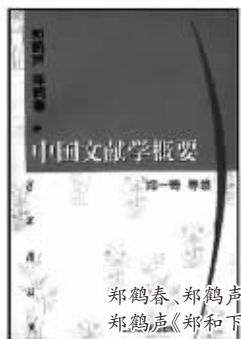
郑鹤春:字萼邨,原名松林,浙江诸暨市浣东街道泰南村人,(1892—1957),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武昌高等师范。随后任教于浙江嘉兴、杭州、台州等地,曾任浙江第一师范教务主任、第六、第十师范校长等职,1925年任昆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对语言学、地理史学、郑和研究贡献颇著。1929年任云南省元谋县县长,后赴上海教育局任秘书,不久在杭州浙江省教育厅任科长。1933年调安徽省教育厅任秘书长,1937年任安徽省庐江县县长。抗战爆发后,到重庆任职于中国茶叶公司专员,1938年受派遣在云南创建云南中茶公司,任总经理,是冯绍裘、范和钧等人的顶头上司。主管顺宁茶厂、佛海茶厂、昆明复兴茶厂、下关康藏茶厂、宜良茶厂、昆明营业部、宜宾营业部以及云南中茶办事处控制云南全省茶叶内销、外销的准运证审批。1946年从云南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富滇保险公司总经理位上离任,任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信托部副经理、经理。在中共地下党的动员下,他留在大陆,解放后在上海虹口中学任普通教师,1957年清贫逝世。郑鹤春一生担任教育工作二十六年,长于地理学、历史学、中国文献学的教育与研究。著作有《中国地学史》、《中国史著之研究》、《中国文献学概要》(与弟弟郑鹤声合著)等。

郑鹤声(1901—1989),著名历史学家、文

献学家。原名松表,字萼菴,号鹤皋,后改号萼菴。1901年5月19日郑鹤声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属绍兴市)高湖乡(今双桥镇)郑村。幼年体弱多病,9岁始入私塾,12岁考入枫桥大东高等小学,半年后转入北乡公学,后以第一名毕业,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潜心攻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民国9年(1920)夏,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文史地部(1921年该校合并于国立东南大学),受学于历史学家柳诒徵、地理学家竺可桢。民国14年(1925)毕业后,在云南高等师范任教,并兼课于东陆大学。1924年毕业时将论文《汉隋间之史学》撰成10余万字专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5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高等师范、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编审、教育部编译馆专任编译兼人文组主任。国立编译馆转为国史馆后,任纂修兼史料处处长。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史馆改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此间,曾兼课于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史部目录学。1951年至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历任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58年随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曾任政协山东省第二至五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郑鹤声从1919年起即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治史60余年,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尤长于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通史,撰写26册之巨的《正史研究》和《正史目目》、《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等。民国24年(1935),开始研究郑和,经十余年努力,出版《郑和》一书,2年后又出版《郑和遗事汇编》,奠定了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的地位。民国32年(1943),出版《中华民国史》。他勤奋治学,一生出版和发表著述160余种,20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史》、《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民国建国史》、《汉隋间之史学》、《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郑和》、《郑和遗事汇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与郑一钧合撰)、《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等。

(下转2、3版中缝)



郑鹤春、郑鹤声合著《文献学概要》,郑鹤声《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堂夜读的生活,无论寒暑,始终如一。我虽是学堂出身,对日学还有些根底,就是受了这两位老师的指教。1912年我考入枫桥镇(离家二十五里)大东乡高等小学,半年后转入上北乡公学(离家五里)。在小学读书时,我各门功课总是八九十分,大考的时候,常常位列榜首,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小学毕业后,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此

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 之安志洁与俞秀松(3)

1936年7月28日,年方十七岁的新娘盛世同和三十七岁的新郎俞秀松,终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迪化西公园礼堂,名流会聚,贤达毕至,新疆的名人、要人基本上都出席了。新郎俞秀松穿一身黑色毛料西装,安志洁则身披洁白婚纱,手捧大束鲜花,在悠扬的乐声和人们的祝福声中,踏上了红地毯。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全体同志都来祝贺,俞秀松用俄语向他们介绍了两人谈恋爱的经过。为了体现对这场婚礼的重视,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来了电影摄制组,拍摄了一部有关他们婚礼和新疆习俗的纪录片,在迪化和莫斯科放映。盛世同说:“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新疆的风俗习惯》,同时还应有一个副标题‘反帝会秘书长王寿成和盛督办胞妹盛世同结婚典礼’。”

大哥盛世才也送去两箱礼物,打开一看,全都是进步书籍。当时的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总领事阿必列索夫也带去了斯大林赠送的一箱衣服和化妆品,转达了斯大林对新郎和新娘的



斯大林送给俞秀松夫妻的照相机

祝贺。斯大林赠送结婚贺礼,这在中共党员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当天晚上,苏联驻新疆领事馆还派官员到新房来道贺。而在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斯大林又给他们送来了礼物:一架照相机(这架照相机于1982年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斯大林对俞秀松是何等钟爱器重。

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婚姻,尽管披上了政治外衣,但其中甜蜜只有那对新人自己知道。在盛世同的眼里,俞秀松是丈夫,是兄长,也是朋友。他们婚后的生活和谐而清廉,1937年,盛世才拍省府主席李溶给俞秀松送来省教育厅厅长的委任状,俞秀松和妻子商量后退回去了。他不求荣华富贵,依然胸怀年轻时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远大抱负。他们夫妻俩在从事反帝、建设新疆工作中,向延安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等物资,并培训了党派去的飞行人员,积极组织了对西路军失败后入疆的李先念等四百多名红军官兵的援救。应该说,这些举动都是经盛世才同意的,此时的俞秀松和盛世才关系也是良好的。

新婚的日子,盛世同还处在良宵苦短的蜜月里,谁知巨大的苦难从天而降,一下子把她从天堂砸入地狱。俞秀松突如其来的被捕,让盛世同记忆难忘。1937年12月27日晚,俞秀松在外开会,检查学生自修后还没有回家,盛世同为准备次日的生物考试正在复习功课。盛世才的四个卫士提着马灯突然来到俞秀松所在处,说是督办要请秘书长商量要事,

立即就用小汽车把他接走了。那天夜里俞秀松没有回到家,盛世同打了一夜电话,盛世才只说俞秀松在苏联领事馆办事。这一夜盛世同心绪不宁难以入眠,总觉得丈夫出了什么事情。果然,第二天盛世同去学校参加完考试,刚进家门,厨师就泪流满面地告诉盛世同,秘书长被抓,公安处叫她将被褥和洗漱用品赶快送去。盛世同抓起电话便质问盛世才,盛世才要与他当面一谈。这一去,盛世同才知道,有人告秀松与“托派”有关,参加了一个阴谋暴动案,过几天还要开公审大会。盛世同问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盛世才回答说是共产党的王明。盛世同大骂:“如果不是事实,我就枪毙你!”盛世才一听小妹竟敢说说要枪毙他,顿时暴跳如雷,一声喝令,要士兵把盛世同抓起来,士兵谁也不敢下手,盛世才只得来软的,说待他查明事实后,就将他那个共产党的妹夫马上放出来。

原来,一切都是从1937年11月开始陡然改变的。那年那月。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回国参加抗日。他俩途经乌鲁木齐时,盛世才设宴招待,并拿出由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二十五位中共党员的相片,问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些人。俞秀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和王明共事,对王明和米夫搞宗派主义很是不满,是王明、康生等人在苏联时的老对头。王明于是挟嫌报复,在苏联就向斯大林告状说俞秀松等人是“托派”,此时更示意盛世才,要他把这些“托派”逮捕起来送交苏联审问。

王明为什么要整俞秀松呢?说来话长。1925年10月28日清晨,俞秀松带领中国共产党选派派的102名学生,在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邮轮。俞秀松被任命为临时委员会书记,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中山大学把来自中国各党派及法国等西欧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共编为11个班,俞秀松和邓小平、沈泽民、左权、屈武等分在七班,人称“理论班”。这个班以学习共产主义原典为己任,共四门课:列宁主义、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接着又成立了一个速成班,成员全部从中国学生中选拔,其中就包括了俞秀松、

刘少文、王明等十多位曾学过俄文的学生。这当中除王明刚入团不久,其余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

话说这位王明,的确也是一表人才,性敏聪慧,不过他非常特别,四门课中他只对一门感兴趣——列宁主义。只要上这门课,他就像是发言又是提问,很是积极,其他的课他便草草应付算数。同学们很快发现,他这样做是冲着任课老师——中大校长米夫去的。俞秀松很看不惯他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曾经当面批评过他,但米夫却很喜欢王明这个年轻、秀气、聪明的中国青年,米夫从此成了他的靠山。他很快入党,当上了中山大学公社主席,又转为联共党员。这个原本在中国党内并没有多少资历的人,对俞秀松等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嫉妒恨,而俞秀松这位秉性耿直、作风正派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对王明的那套做派也横竖看不惯,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1927年11月,俞秀松已经考上列宁学院,离开了中大,但王明还是给他编织了一个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江浙同乡会。可以说,当时的陈修良、吴先清等人,都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她们都是江浙人,都因此被扣上了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的帽子。1931年,王明回国掌中共组织大权,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此时的俞秀松正在列宁学院学习,他坚持反对王明路线,结果被王明集团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扣上了“托派”的帽子。

在俞秀松一案中,肯定还有着更为隐秘复杂的原因,斯大林本人在这冤案中的因素是绝不可低估的。总之,王明、康生离开乌鲁木齐回延安后,盛世才突然便将俞秀松等人逮捕了。

平心而论,盛世才许多亲属当时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盛世同在莫斯科红军大学读书的四哥盛世骥和在东方大学读书的五哥盛世骥都向大哥据理力争,他们的母亲则气得昏过去好几次。盛世骥得知妹夫被大哥抓起来的消息,便直接打电话、发电报。言辞中斥责盛世才此番行为,要求立即放人。盛世骥甚至还与盛世同一道谋划,要找一个死囚代替俞秀松坐牢,只是这一计谋没有成功。



结婚一周年,周斯大林赠送的照相机拍了这张合照